

隱形的詩：《儒林外史》的「詩」敘 述探析*

鄭博元**

提 要

《儒林外史》敘事者隱去了小說中大部分的「詩」，人物在作詩、談詩的情節中，敘事者都未將詩引出。詩的「隱形」使讀者無法藉由人物之詩判讀其人與賦詩意圖，小說卻又屢以情節呈現詩在士人交際過程中的影響力。本文意圖指出「詩之隱形」為敘事者的有意設計，並探討敘事者隱去詩之目的與效果。先由

本文 109.02.15 收稿，109.07.07 審查通過。

* 本文原為高桂惠先生「明清小說專題研究」課堂報告，曾宣讀於「臺大中文系第 50 期《中國文學研究》暨第 40 屆論文發表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2020 年 5 月 1 日）。寫作與修改過程中，多方得益於高桂惠、鄭毓瑜、康韻梅、陳柏言等先生指教，以及論文發表會特約討論人劉柏正先生、編委會和諸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謹致謝忱。惟一切文責由作者自負。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班二年級。

DOI:10.29419/SICL.202007_(50).0005

金錢、社交、精神三方面分析詩的功能與價值，歸納士人看待詩的態度，再從這些詩作的「生產途徑」與「詩體傾向」，指出敘事者對於詩與名利掛鉤的批判。而在權威敘事者隱去的情形下，小說中少數士人試圖以詩記錄自身生命史，表現出「詩」短暫安頓士人不遇的可能。然而，在敘事者筆下，小說中的詩作始終被隱形，詩作與詩人等史事記錄也遭刻意混淆，敘事者以此暗示「詩」與「史」都已無效、衰落，遂以「小說」文體描寫儒林故事，寄寓對文人衰世的哀嘆。

關鍵詞：儒林外史、詩、士人、史

Hidden Poems: Analysis of the Narration of Poems in *Rulin waishi*

Cheng Po-yuan*

Abstract

In *Rulin waishi*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Scholars*), when the characters write or talk about poems, the narrator omits the poems from the novel. The “invisibility” of the poems hinders readers from interpreting the characters or their intention to write poetry through their poems. However, the interaction among scholars in the story is permeated with influences from poetry. This study considers the invisibility of poems an intentional design by the narrator and discusses the purpose and effect of this design. First, the attitude of the scholars depicted in *Rulin waishi* toward poetry is analyzed regarding the functions and values of poetry from the money, social, and spiritual aspects. Subsequentl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narrator’s criticism of the corrupt connections between poetry and personal gain according to how the poems were produced and the forms of these poems. In addition, in the absence of the authoritative narrator, the characters’ endeavors to document their lives as poems revealed the ability of poetry to temporarily distract scholars from worrying about misfortune. However, the narrator revealed the ineffectiveness and fall of poetry and history via the hidden

* MA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oems and the confusing historical records in *Rulin waishi*. Therefore, the narrator bewails the misfortune of scholars as well as concerns about society in the form of vernacular novel.

Keywords: *Rulin waishi*, Poem, Scholars, Shi (History)

隱形的詩：《儒林外史》的「詩」敘述探析

鄭 博 元

一、前言

《儒林外史》¹ 以細瑣的人物群像為敘事結構，² 將眾多人物串聯成長篇章回小說，是成書過程中必然遇上的難題。在全書的謀篇佈局中，吳敬梓（1701-1754）是以「人物聚談」讓角色之間產生交集，使敘事重心從一角過渡到另一角色，小說中因此由大小不等的人物聚談場合綴連而成。聚談交誼中，「詩」是士人間的熱門話題，不論身份是以舉業為主的「經生」或熱衷文藝創作的「文人」，多對「詩」表現出十足興趣，小說中也不避諱描寫「作詩」場景；然尤其矛盾的是，在人物來往、聚談與詩會的情節之後，這些「詩」並未出現。敘事者提供了作詩、評詩、談詩等場景敘述，甚至已經亮出詩的題名、韻腳，使人們對詩表達

¹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本文小說引文皆同此版本。

² 魯迅有評：「惟全書無主幹，僅驅使各種人物，行列而來，事與其來俱起，亦與其去俱訖，雖云長篇，頗同短制；但如集諸碎錦，合為帖子，雖非巨幅，而時見珍異。」見氏著：《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43。

評價。讀者心弦被詩撩動之後，敘事者卻無意使詩顯形。雖能從小說敘事中得知「詩書」已被展開，「詩句」已被朗誦，讀者卻無法讀到其詩。小說中多數角色的詩皆被「隱形」，而小說主要人物杜少卿則全無談詩、作詩的情節，表現對詩的「迴避」姿態。因此，小說中士人看待「詩」的態度，以及敘事者將詩「隱形」意圖，有待深入考察。

「詩」作為傳統文人「感物吟志」的重要媒介，不僅體現詩人與外在世界的互動關係，也是彰顯詩人「心志」的代言體。敘事層次上，「詩筆」的運用在中國古典小說中，一直是不可忽略的特徵。六朝小說已有詩歌穿插的現象，唐代小說中詩與文的配合關係更為多元，詩擔負了敘事與抒情的多重功能；宋元話本小說、明清章回小說，則常在入話、結尾與過場中插入詩句以渲染氣氛、揭露小說意旨。然而，《儒林外史》卻幾乎刪去了過去白話小說敘事者（說書人）常使用的「詩詞」，因而使敘事者的聲音被隱去。在這部假託「外史」的小說裡，缺乏權威敘事者的評價與引導，小說人物各自發聲，展演士人的生命史。小說中的部分士人，將留名史冊的渴望寄託在「詩」中，如參與詩會、刊刻詩集，使士人之詩名流傳。「詩」與「史」在小說中的互動關係因而耐人尋味。

關於《儒林外史》的詩敘述，論者多以「士人生活」為旨探討江南士人的交往與閑趣，³ 或討論明清士人的文藝社會與文化現象，⁴ 未深入「詩」敘述的分析，也未論及這部小說中「詩」與「詩筆」的功能。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小說「詩意」、「抒情意境」討論，⁵ 樂衡軍將政治權力中心（北京）與文人的漂泊核心（南

³ 顧鳴塘：《《儒林外史》與江南仕紳生活》（上海：商務印書館，2005年），頁246-258。
鄭睿衫：《《儒林外史》人倫觀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

⁴ 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0期（2018年11月）。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

⁵ 論者亦探析《儒林外史》的抒情性質，如商偉：〈跋：《儒林外史》的詩意場域：鄉愁與失落的家園〉，見氏著：《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

京)為二種對立的漩渦,視《儒林外史》為一部秀才的流浪史;⁶商偉注意到《儒林外史》在白話小說的敘事形式中,隱然透露的「詩意」氛圍,他在書跋中提出,認為這是由於吳敬梓意識到「苦行禮」無法解決「二元禮」弊端下,重新安置文人的方式,但是仍無法挽救搖搖欲墜的精神家園。他同時注意到小說中詩歌的缺席,但未多作申說。⁷

本文聚焦《儒林外史》中隱形的「詩」敘述,探查作者隱詩之意圖與敘事效果,首先透過士人看待「詩」的方式,分析小說敘事者關於「詩」的敘述策略與其中寄寓的批判,再觀察敘事套語(詩詞)隱去的現象,與小說士人以詩留名的意圖,探討小說中「詩」敘述的歷史寄寓。

二、士與詩：小說中「詩」敘述策略與批判

《儒林外史》對於士人談詩、作詩的情節多有著墨,但這類描述通常集中於小說前三十回,在之後回目裡出場的士人較少有類似的敘述。若由小說中「士人」對詩的態度來看,大致可區分為兩類型的士人。本節探討兩類士人的心態,再由這些士人詩作的「生產途徑」與「詩體傾向」觀之,理解敘事者對於這些詩作的批評。

三聯書店,2010年),頁381-408;高友工:〈中國敘述傳統中的抒情境界——《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讀法〉,收錄於氏著:《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謝佳滢:〈論《儒林外史》的抒情地景——以南京和蘇杭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019年第33卷第1期,頁23-42。

⁶ 樂蘅軍:〈世紀的漂泊者——論《儒林外史》群像〉,《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頁165-184。

⁷ 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387。

(一)「逐名」與「迴避」的兩類士人心態

本節由「對詩的態度」，區分出兩類士人，並從三種「詩的功能、價值」（金錢、社交、精神）分析士人對詩的相異態度以及箇中原因。再回到小說楔子中王冕在作詩畫中面臨的名利危機，探討敘事者對士人的警示與批評。

1. 以詩逐名的士人

首先談小說中以詩炫示的士人。匡超人本是一貧寒少年，只追求舉業知識，卻在社會化過程中學習讀詩、作詩，定加入詩會。在舉業與文藝場合多有表現，獲取名利，而搖身一變成為勢利貢生。在這段身份轉變過程中，「詩」的習得或為其順利步入文藝社會的助力。⁸

當匡超人甫考取秀才進學，換上衣巾，從平民百姓躍升為「生員」的士人身份。進城後，首先遇見景蘭江：

走進飯店，見裏面點著燈，先有一個客人坐在一張桌子上，面前擺了一本書，在那裏靜靜的看。匡超人看那人時，黃瘦面皮，稀稀的幾根鬍子。那人看書出神，又是個近視眼，不曾見有人進來。匡超人走到跟前，請教了一聲「老客」，拱一拱手。那人纔立起身來為禮。（頁 220）

在這段描述中，匡超人進門並未引起景蘭江的注意，乃因其專注力完全被書給攫取。匡超人見對方無反應，方才上前出聲請教。景蘭江的遲應可被解釋為此「書」的吸引力；然而，已走多天路，背著行李的匡超人，進門時可能腳步已拖

⁸ 論者多以匡超人的社會化過程，作為「科舉文化敗壞人心」的佐證。評論目光總聚焦於前後形象差異所營造的諷刺效果，強調其背信忘義、心懷鬼胎的形象。但若細讀相關篇章，匡超人的性格並非急速劣化，而是歷經複雜的心態變化歷程，「詩心」的萌生或為其中關鍵轉折。李漢秋對匡超人的墮落表達同情，將矛頭指向社會的黑暗。見氏著：《儒林外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54-56。

沓，甚且影響了室內燈的光影變化，如此動態的干擾，竟猶不及一本被靜靜閱讀的書。匡超人顯然也注意到此「書」的特殊性，接下來的描述中，匡超人的視線始終離不開此書，次日登船後，「那景客人就拿出一本書來看」，匡超人強忍好奇，只「偷望那書上圈的花花綠綠，是什麼詩詞之類」，下午吃過飯，景蘭江「又拿出書來看」，匡超人終於按捺不住相問。小說以景蘭江的故作姿態吸引匡超人，這是他與「詩」的初相見，但文字敘述中並未引出詩作、詩句。

隨後匡超人與景蘭江有一番對話：

匡超人道：「老客既開寶店，卻看這書做甚麼？」景客人笑道：「你道這書單是戴頭巾做秀才的會看麼？我杭城多少名士都是不講八股的。不瞞匡先生你說，小弟賤號叫做景蘭江，各處詩選上都刻過我的詩，今已二十餘年。這些發過的老先生，但到杭城，就要同我們唱和。」（頁 221）

當景蘭江告訴他「詩」比「時文」重要得多，匡超人長久以來以「時文」為絕對優先的價值觀逐漸動搖；而生意人景蘭江自稱與新學臺同年、嘉興籓太守等人皆是「友」時，匡超人的反應是「不勝駭然」。景蘭江的炫詩行為在匡超人心中，與他「苦讀中舉」的目標產生衝突，⁹但他隨後意識到學詩的益處。之後的敘述中，匡超人跟隨景蘭江及其友人聚談，積極吸收「詩」的知識。及至拿了舊日詩會的詩稿給匡超人賞鑒時，匡超人先是佯裝懂詩：「接過詩來，雖然不懂，假做看完了，瞎贊一回」，他眼中只見題名：「暮春旗亭小集」、限「樓」韻，以及眾人的名號，且「目中無詩」：「（匡超人）看見紙張白亮，圖書鮮紅，真覺可愛，

⁹ 景蘭江諸多言論都點出其衡量標準在於此途究竟能否助士人成名，其中更大的張力在於「時文」與「詩」的關係。景蘭江以「詩名」為落第者成名的替代方案，甚至將詩名擺在舉業之名前。他不僅排斥時文，更貶低做時文者，二文體的衝突也在於「舉業士子」與「文人」的價值對立與資源競逐。見王鴻泰：〈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頁 2-7。

就拏來貼在樓上壁間」(頁 229),讀者因此無法從小說得知詩句內容與詩的良窳。匡超人逞強答應「詩會」的邀請,並購買作詩參考書練習,成功創作;後也因而加入詩會、結交詩友,名氣日盛且邀約不斷。

上述匡超人的例子暗示著「詩的誘惑」來自於對詩的「價值」估量,誠如王鴻泰的明清士人文藝生活研究,透過文藝市場換取名利以安身立命,是中下階層士人普遍的謀生的方式。¹⁰ 顧鳴塘也曾從歷史材料考察《儒林外史》中士人的經濟狀況,分析這些士人的主要收入來源,除了出仕(京官、地方官),其他諸如擔任幕僚、清客,以及教學、行醫、經商、編選時文、潤筆,或其他不穩定的收入(堪輿、占卜、星象、受贈)等。¹¹ 從小說中可以發現,來自各行各業的人物,大多參與了小說中賦詩的行列,其中原因在於詩的「價值」。談詩、作詩與刊刻,絕不僅在抒情言志的「精神價值」,對於小說中的士人來說,此中更重要的是詩的「名利價值」。作詩多半不能直接換取金錢,其機制是透過「詩」的傳播,與其他當地名士的唱和,以利名氣抬升;取得「名」後就能晉升成社會地位較高的「名士」,便能獲得文藝工作的機會與種種利益,如上述提及的幕僚、清客、教學、選文、潤筆等工作。「詩」因此能幫助士人得名,並間接換取實質的金錢利益。

小說中「詩的價值」大致可以「金錢」、「社交」、「精神」三面向來分析。首先談詩的「金錢價值」,詩直接換來的「金錢」利益雖不多,但仍有少數例子。如小說人物萬中書在席間忽然被提拿,原因在於他收受賄賂,因此以「詩箋」奉承撫臺,為苗鎮臺說情,卻被搜出成為呈堂罪證:

祁太爺道:「那苗鎮臺疏失了海防,被撫臺參拿了,衙門內搜出你的詩箋,上面一派阿諛的話頭,是你被他買囑了做的,現有贓款,你還不知麼?」

¹⁰ 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頁 135-138。

¹¹ 顧鳴塘:《《儒林外史》與江南仕紳生活》,頁 71-134。

萬中書道：「這就是冤枉之極了。中書在家的時節，並未會過苗鎮臺一面，如何有詩送他？」祁太爺道：「本府親自看過，長篇累牘，後面還有你的名姓圖書。現今撫院大人巡海，整駐本府，等著要題結這一案，你還能賴麼？」（頁 620）

萬中書以詩阿諛奉承撫臺，換取賄賂贓款可說是「詩」換取金錢價值的例子。他為了躲避罪名，矢口否認為「詩」的作者，聲稱自己生平不曾作詩、不會作詩，以脫罪名。從中也可見詩在金錢價值以外，猶有官場利益的交換功能，即以詩說情、脫罪。

小說中多數的例子，是先以「詩」作為談資，再利用社交網路宣揚名氣，並取得利益。以前述匡超人為例，他本已有「時文」能力，再經過景蘭江的一番「詩」的薰陶。詩會中敘事者特別描寫匡超人將「詩」貼在壁上的舉措，從此立名。取得「詩人」與「選文家」雙重身份的名，匡超人開始了他的文藝事業，包括幫寫「婚書稿」、「文書硃籤」，甚至違法做「考場槍手」，賺取了大筆橫財。匡超人從原本的貧民身份苦讀取得「士」的身份，卻仍清貧無依。從小說敘事的安排中可見，加速他成為「名士」的因素，「詩」為其中助力之一。之後果然平步青雲，不僅「貢入太學」，還隱匿已婚的身份，娶京師李給諫女兒為妻。

以下再舉二例，小說第十二回的鶯脰湖詩會裡，婁二公子府上養了不少清客，「詩」是這些名士必備的技能。婁二公子邀集名士蘧公孫、牛布衣、楊執中、權勿用、張鐵臂、陳和甫等人，他們在詩會上作詩展才，並於婁氏府上作客維生，以「詩」與其他才能換取婁氏公子信任。蘧公孫便是以「詩」騙取名利的「佼佼者」，他的詩才卻非天生或後天培養，乃是來自於其他途徑。其父蘧太守因緣際會發現了一本親筆繕寫的《高青邱集詩話》，蘧公孫因此有意藉此成名：

蘧公孫聽了，心裏想道：「此書既是天下沒有第二本，何不竟將他繕寫成帙，添了我的名字，刊刻起來，做這一番大名？」主意已定，竟去刻了起來，把高季迪名字寫在上面，下面寫「嘉興蘧來旬駢夫氏補輯」刻畢，刷印了幾百部，遍送親戚朋友；人人見了，賞玩不忍釋手。自此，浙西各郡都仰慕蘧太守公孫是個少年名士。蘧太守知道了，成事不說，也就此常教他做些詩詞，寫斗方，同諸名士贈答。（頁 110-111）

他將《高青邱集詩話》孤本據為己作並刊刻的行為，果使他成為少年名士，因此能出入當地詩壇，祖父蘧太守也不阻止偷詩劣行，默默相助他取得詩「名」。作詩、寫斗方、與名士相互贈答都是詩在社交功能上可換取的利益。而後蘧公孫受到婁氏二公子的賞識，不僅稱讚「如此大才，我等俱要退避三舍矣」、「少年美才」，還引介給魯編修，最終以詩名騙取一樁高門婚姻。從小說中有聲望人士的讚許，到引介給其他名士，順利博取高官讚賞，竟能以「詩才」入贅「時文」大家魯編修之門，可見「詩」有助於拓展社交人脈，並從中換取名氣與金錢利益。

小說中另有三位牛姓士人，彼此並無關係，卻因為士人宴集與遊歷而互有關連，首先出場的牛布衣以「詩」聞名，是婁二公子府上的清客，以詩才換取生活所需，但在婁氏公子多次受騙後，閉門不再養士。牛布衣再無依靠，只得帶著詩集流浪，他最終病死於一庵中。隨後出場的牛浦因家貧，偷錢買詩到庵中閱讀，他偶然發現牛布衣的遺物與詩稿。敘述中，描寫牛浦的視角裡看到上頭寫著「呈相國某大人」、「懷督學周大人」、「與魯太史話別」、「寄懷王觀察」，因此想：「可見只要會做兩句詩，並不要進學中舉，久可以同這些老爺們往來，何等榮耀。」（頁 264）牛浦郎不僅偷取此詩稿，更大膽「盜竊」了牛布衣的「詩人身份」，將己名合其號，以「牛布衣」之名行走江湖。之後他果然憑著牛布衣的詩人身份受到尊敬，甚至使董孝廉聞之而來拜見，正如小說敘事者的預測：「立心做名士，有志者事竟成」，驕心遂起的牛浦，甚至冒稱秀才。在盜取牛布衣詩過

程中，唯一吸引其目光的也非詩的本體，而是太守、司馬、明府、少尹的「名號」。敘述中全無引詩，也無對詩的品評，讀者因此也難以判別牛布衣詩之優劣，進而對其人做出評價。偷取牛布衣詩之假詩人牛浦，藉「詩」揚名牟利，正是著眼於詩的社交功能與價值。

牛浦盜詩後偶遇另一詩人牛玉圃，被收為姪孫，一同參與士人談詩的場合。牛玉圃數度向士人聲稱自己名氣之大，人們向他求詩、送斗方、送扇子、送冊頁。當牛玉圃將牛浦之詩（實為牛浦假冒牛布衣刊刻之詩）給另一士人看時，小說敘事者巧妙地阻止了這本「假詩集」的掀開，讓詩集停留在封面：「萬雪齋正要揭開詩本來看，只見一個小廝飛跑進來稟道：『宋爺請到了。』」（頁 283），敘事者暗示著此本詩集只存其「名」，缺乏「詩」抒發心志的功能，因此無須翻閱。隨後二牛產生嫌隙，牛玉圃見牛浦因名不符實，應答進退頗無士人之風，牛浦也從旁人口中發現牛玉圃的交際對象也非高門之士，雙方發覺對方無甚利用價值後，相互陷害並反目成仇。不過，因詩得名的牛浦之後頗為快活，不僅冒名詐騙、欺負平民，最終在衙門藉著「講詩」為名，並娶妻成家。

從詩的金錢價值、社交功能可發現看似信筆揮就的「詩」可能價值連城，士人可從「詩」中獲取利益，並且以之成名、維生。而小說中使這些詩「隱形」，讀者因此全不見詩作本身的良窳，只見詩的功利目的，失去了詩「抒情言志」的功能。詩的「隱形」暗示著小說人物對「詩」內容不以為意，間接表明了士人用詩多半是用作「名利」的考量。「詩」成為士人取得「名」的便宜手段。士人無意言志、抒懷，因此敘事者也毋需將詩句引出，或使小說人物讀出。詩之「隱形」因此是對這些士人的強烈批判。

對於這些詩人來說，詩被工具化為換取「名」的媒介，在小說人物對於「詩人」與「進士頭銜」的較量中，可見其比較的基準是「名」的有無：

景蘭江道：「可知道趙爺雖不曾中進士，外邊詩選上刻著他的詩幾十處，行遍天下，那個不曉得有個趙雪齋先生？只怕比進士享名多著哩！」（頁225）

景蘭江對詩有高度熱忱，他將「詩」與「舉業」並置而觀，甚至認為前者能換取的「名」或恐超越作「時文」者。小說中另有一段聚眾討論究竟「中進士」或「享詩名」好，景蘭江說服眾人後者為佳。王鴻泰曾以此討論明代士人對「科舉功名」與「社會聲名」的價值排序，分析明清士人的「求名」手段的心理淵源，大抵是不情願全然受限於科舉仕途之中，因此以文藝創作自我表現；而這類賣文、作文相贈的商業與社交活動使得士人獲得聲名等價值，可說是明清文藝社會蓬勃之因。¹² 從小說中的敘述，可見下層士人對於「名」的汲汲追求，因此他們談詩、論詩，以「詩人」身份自居，將重心放在「詩」而非「時文」，以免被認為是時文舉業的失敗者。

小說中這類士人從「談詩」到「興辦詩會」，都包藏著以「詩」換取「名」的意圖。對於「詩名」的執迷，甚至演變成一群假名士的群魔亂舞：

支劍峰已是大醉，口發狂言道：「何妨！誰不知道我們西湖詩會的名士！況且李太白穿著宮錦袍，夜裏還走，何況纔晚？放心走！誰敢來！」（頁236）

西湖詩會眾人分韻完畢後，一行人同路進城，詩人竟發起酒瘋，口發狂言，隨後戲劇性地遭鹽捕捉拿，此時敘事者才藉由鹽捕之口，透露其真實身份為「鹽捕分府鹽務巡商」，被提拿的原因乃是頭上的方巾不符規定。小說敘事者揭露這些士人身份，有鹽務巡商、醫生、帽子店主、生員等，但他們都穿戴身份不應配享的

¹² 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頁135-138。

服飾（方巾、寶藍直裰、瓦楞帽子），可見他們對於真實身份的自卑。而自比李白醉酒賦詩的行徑，正是藉由利用「詩」進行一套風流名士的表演，以抬升自己的文人形象與社會身份。

2. 迴避作詩的士人

小說中熱愛詩的士人們在鶯脰湖大會、西湖詩會二場宴上馳騁詩意，敘事者以諷刺語調嘲弄之。（頁 163）在鶯脰湖大會結束後，小說敘述另一名士張鐵臂身份被揭露，實為一騙徒；西湖詩會則終結在一場官方抓捕，名士紛紛被摘下衣冠，狼狽離去。敘事者有意提醒讀者，在「不可靠」的詩表演下，¹³ 任何人都能利用「詩」話語混淆真偽。此類「詩人」的下場顯然是一警惕，之後出場的另外一類士人一改這種大量談詩、作詩的形象，反以「迴避」的姿態面對詩。

書中的核心人物為杜少卿，小說敘事中多次以旁人私下言談表示他具有極高的詩才，¹⁴ 但是小說中卻未有任何杜少卿「作詩」的敘述。從文中可知，杜少卿的詩集在士人之間流傳，並受到高度讚許；但是每當敘事鏡頭聚焦於杜少卿時，他從不曾作詩，也缺乏任何作詩之「意」。饒富意味的是，他卻對《詩經》學問別有一番看法，他纂輯的《詩說》文章深受友人敬佩。¹⁵ 研讀《詩經》、纂輯《詩說》，且有詩集傳世，杜少卿對「詩」如此嫻熟，卻拒絕在小說中談詩、

¹³ 李志宏以美國學者布思的「不可靠的敘事者」理論審視《儒林外史》的敘述者，指出敘述者權威的自我消解，與敘述者的不可靠性，構成了小說反諷性敘述的現象。而本文認為小說中的「詩」敘述更為明顯地展現了此種「敘事者的不可靠性」。見氏著：〈《儒林外史》敘述者形象及其敘述的可靠性問題〉，《國北教語文集刊》第 20 期（2011 年 7 月），頁 162-164。

¹⁴ 武書、虞博士表示曾見過他的詩集，並讚為奇才。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頁 448。

¹⁵ 杜少卿纂輯《詩說》，是對《詩經》的個人新詮釋，他也在小說中具體展現經典的可實踐性。同前註，頁 423-425。

作詩，或許側面說明了他對於「知音」不存的感嘆。¹⁶ 由於真正懂詩者少，他不願與俗人談詩，因而呈現出小說中的迴避姿態。

儘管小說中杜少卿似乎迴避了作詩的場景（或敘事者的刻意避免），卻因他「詩壇祭酒」之名氣，避不過眾客慕名而來以詩作請教之景；然而，在此類敘述中，杜少卿卻從未對這些士人的「詩」與「詩集」做出任何評價。他多是收下了一本本客套、應酬的「詩集」，就再也沒有相關的描述。他也拒絕在現場翻閱、進行評價。¹⁷ 杜少卿作為一深厭「科舉」、「名利」的角色，從他拒絕朝廷的徵辟可見其不慕榮利的性格。如此角色卻拒絕以「詩」展現其風流任性，有特殊意味；作為詩壇名家，小說理應出現他對「詩」的文藝創作或評論，然卻付之闕如。反而隱然透露他的迴避：

四個人走過來，看見他傍邊放著一把白紙詩扇。蘧駝夫打開一看，款上寫著「蘭江先生」。蘧駝夫笑道：「是景蘭江！」景蘭江抬起頭來看見二人，作揖問姓名。杜少卿拉著遲衡山道：「我每且去尋房子，再來會這些人。」（頁 407）

杜少卿往見蘧公孫，是由於其為世兄蘧太守之孫，杜少卿與其祖有交誼而相見。當杜少卿喫茶過後欲走，此時喜以詩炫示的景蘭江以「詩扇」現身，將要與杜少卿、遲衡山等人結交閒談時，杜少卿卻快步離去，之後雖有再會、備酒回請，但僅以簡單敘述帶過，也沒有談到此類士人熱衷的「詩」。對於熱愛談詩、作詩的士人景蘭江來說，不談詩顯然不甚尋常，杜少卿的避走可視為對其「詩」的拒絕。

¹⁶ 感謝匿名審查人意見，提出可以「知音」之不存解釋杜少卿對於「詩」之迴避。

¹⁷ 「道士足恭了一回，拿出一卷詩來。郭鐵筆也送了兩方圖書。杜少卿都收了」、「杜少卿就不敢再說了。李大人留著住了一夜，拿出許多詩文來請教。」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頁 409、413。

杜少卿等士人對「詩」的看法，迥異於景蘭江之流。同上一節以「詩的價值」進行分析，在「金錢價值」方面，¹⁸ 小說中曾提及虞博士將「應酬詩文」交付杜少卿，以貼補他的困窘生活。其他監生覬覦這些詩文工作，要求虞博士勿將此機會交付沒有科考功名的杜少卿，並指杜騙財、詩文品質不佳，盼虞博士將這些詩文機會交付給國子監人；然而虞博士反駁之，強調杜少卿的「才名」極高，並表達他與杜少卿的交誼。由於杜少卿堅不出仕，加之過於慷慨助人，而致使生活困窘。言談之中，虞博士僅僅想藉由這些「應酬詩文」的發派接濟杜少卿。¹⁹「詩文」有其市場價值，但對虞、杜等人來說，應酬詩文的金錢價值的功能在於維持杜少卿的生活所需，並非用以博取大量金錢利益。

詩的「社交功能」則表現在小說中士人「拿詩請教」的情節。以詩請教是士人交際的起手式，或以己詩向對方請教，或拿對方詩作請教之。在交流過程中，向對方展示己之詩才，或表示認同對方才情，拉近彼此交誼。小說中相關的情節甚多，但集中描寫的多為上一節提及的士人，如蘧公孫、景蘭江、洪憨仙、來霞士、陳和尚拿詩請教，這類士人多以詩炫示，且有盜取詩作（蘧公孫）、以詩詐欺（洪憨仙）等行為。小說中並未敘述第二類士人（如杜少卿、莊尚志、虞博士）拿詩請教的情節，反而多是以詩「逐名」士人以詩請教較多，他們期盼能得到名士的稱讚、品評而揚名。

杜少卿被稱作「詩壇祭酒」；然而，面對士人詩的交流要求，他卻興致不高。如上一節提及，他初遇景蘭江的人與詩，卻先行離去，而非相與談詩。小說敘述杜少卿收下這些詩作，卻沒有提出作任何的評價。相反的，在前述詩人（蘧公

¹⁸ 小說另有位女性沈瓊枝賣詩文，但她是因被鹽商騙婚，而自主逃離，為生活所需以賣詩文自立自強，盼能博取俠義之人相助，其中「詩」彰顯的是個人生命的價值，而非金錢價值。同前註，頁 510-511。

¹⁹ 虞博士正色道：『這倒不然。他的才名，是人人知道的，做出來的詩文，人無有不服。每常人在我這裏託他做詩，我還沾他的光。就如今日這銀子是一百兩，我還留下二十兩給我表姪。』兩人不言語了，辭別出去。」同前註，頁 451-452。

孫、景蘭江、萬雪齋等)的拿詩請教段落中,他們夸夸其談,相互哄抬名聲,絕不放過談詩、論才的機會。杜少卿雖與眾多士人交往,但從他不願以「詩」與其他名士進行社交,可看到他對詩的迴避意圖。

對於杜少卿一類士人來說,「詩」的金錢價值不甚重要,而在社交價值方面,則避免以「詩」博取名利。他們仍對詩有相當的興趣,因此有詩作流傳,也被封為「詩壇祭酒」;但敘事者又透過敘述使這類士人迴避作詩、談詩。對此類士人來說,詩在金錢、社交以外猶有其他意義;然而,小說敘事者並沒有直接描寫「詩」對於此類士人的精神意義,而是隱晦地寫他們對於該文體的態度。如在一段虞博士與武書的對話中,透露他們對「詩」的喜愛。虞博士在小說中被標舉為「真儒」、「名賢」,天目山樵也認為他是小說中的聖人。饒富意味的是,書中對虞博士的敘述,始於「詩」。他隨著一位「古文詩詞第一」的賢者學詩,後因考量現實,而被要求改習時文。因此,他與武書的對話中,虞博士表現出對時文的不耐煩,而樂見詩賦、古文一類作品,也因而與喜讀詩賦的學生武書投緣。對虞博士與武書來說,學詩是興趣使然,他們初讀書識字是以「詩」為目標,後因應考試而改習八股文,但心中仍較喜愛「詩賦」,因這類作品能「細細捧讀」。對他們來說「詩」並非追求名利的工具,而是用以品味與抒懷的文體。小說中這些士人唯一一次共同賦詩,是在虞博士的送別會上;然而小說敘事者的描述中,使此次的賦詩聚會有別於西湖詩會、鶯脰湖大會中的眾人大肆唱和、分韻賦詩的荒謬姿態,而僅僅以「在會諸人都做了詩」(頁 563)八字帶過,全無作詩者與詩作的描寫。以此來看,迴避作詩的士人以謹慎而低調的態度讀詩、作詩,其實是對「詩」文體的慎重與珍視,也可能是對前一類士人以「詩」滑稽作態的警覺。而早在楔子中,敘事者便以王冕故事埋下了伏筆。

3. 王冕「詩」畫的名利危機

王冕為小說首位出場人物，有「隱括全文」的標舉意圖。他先是上學堂讀了幾年書，雖後來因家境無法負擔，仍無法阻止王冕對書的愛好，他的閱讀書籍種類紛雜，包含了天文、地理、經史、詩文的內容。他將古人的學問道理內化到自身，以創造性的「繪畫」與「詩作」呈現面對外部世界而生的詩意感受。小說敘事中「詩」首先出現在花卉畫上：「（王冕）回家用心用意，畫了二十四副花卉，都題了詩在上面。」（頁6）王冕用心作詩，也以此貼補生活。即便買詩畫者眾，他卻未因名氣而日驕，不吝於賣——因當時「詩」尚未成為與利益掛勾的「商品」；然而當聲名遠播，本縣令遣人來購畫時，王冕始警覺到「名」與「利」的危險性。敘事者以翰林危素之口讚揚王冕詩畫，他僅憑詩畫便知作者其為「賢士」，危素的褒許中掩映著曖昧的警告：「不但才高，胸中見識，大是不同，將來名位不在你（時知縣）我之下。」（頁6）時知縣對此語斟酌多回，幾番協助傳令召見，但王冕幾次順利推辭隱身，終於躲過名的陷阱，逃向山東。

王冕熱愛詩、畫，但當換取的「價值」超乎生活所需，已累聚成名利時，他便決然捨棄之。然而，文中王冕對名利的畏若蛇蠍會否反倒成為另一種故作姿態的詩人形象？逃往山東後，王冕又受到幾個財主騷擾，於是畫了條大牛，「又題幾句詩在上，含著譏刺」（頁10），以詩為諷，回溯了《詩經》「風刺」的傳統功能。在此，「詩」擔負了作者感悟吟志的抒情功能，同時也確保了「詩」不會成為美化作者形象的詐偽手段。王冕意識到「詩」的正反面效果，因此不斷反思「詩」的用途及位置，以免沈溺於詩之名利之中。諷刺財主之後，王冕警覺到口舌之險而收拾回家，此事告一段落。敘事者適時的收束，免於將王冕的詩人形象推至極端程度，保全了不卑不亢的姿態，將詩意嚴守於名利之外。

當讀者察覺小說中如杜少卿、虞博士等士人對於作詩、談詩的刻意迴避時，不免與前一類滑稽「詩人」進行對照。小說中士人對詩的迴避絕非偶然，而是作者有意識之操作，使得此類士人避免熱切擁抱「詩」可能造成的拙劣效果。

本文雖以對「詩」的態度將小說中的士人大致分作兩類，但在其中仍有模糊地帶。如以杜慎卿為例，他出場時搖著「詩扇」，模樣俊俏有飄然神仙之感，敘事者藉旁人之口介紹道：「去歲申學臺在敝府合考二十七州縣詩賦，是杜先生的首卷。」（頁 360）不同於前述詩人，敘事者以官方考試背書，指出杜慎卿具備極高的詩才。然而，他卻排拒了「詩」的出現。士人以詩向杜慎卿請教，他的態度卻意興闌珊，隨後批評此詩本應像「詞」，卻被「加意」硬作成「詩」，因此意氣「索然」。杜慎卿的批評中暗示他對「詩」的要求極高，若是增意作成的詩，則不如無詩。（頁 360-361）而當他與友人聚會，有人提議以「即席分韻」作詩，杜慎卿馬上拒絕了「詩」的出現：「這是而今詩社的故套。小弟看來，覺得雅的這樣俗。還是清談為妙。」（頁 362），因此「莫愁湖大會」這場名士之宴一改此前「鶯脰湖大會」、「西湖詩會」中賦詩的陳套，代之以戲班的唱作，這場不落窠臼的雅集也因此讓杜慎卿名震江南。

杜慎卿對「詩」的排拒，並非基於厭詩，而是對之更高的要求標準。乍看之下，杜慎清與杜少卿相若，都迴避詩，並以其他方式追求雅致；然而，敘事者透過小說中他人的言談指出，杜慎清對「詩」的迴避包含著故作姿態的「求名」意圖。他拒絕詩會，改聚以眾戲子辦理「莫愁湖大會」因此博得高度的名氣，無人不知；且他在私語時透露，這場大會耗費鉅資，正如回名「逞風流高會莫愁湖」所示，莫愁湖大會一改過去詩會的方式行之，是刻意的風流之舉，並非純然的詩意使然，顯見杜慎卿求名的野心。小說也以介於詩意與荒謬之間的滑稽情節，取笑杜慎清的假「詩意」，如他被戲耍誤以為有風流俊雅的詩人拜訪，沒想到卻是肥胖道士，因此接過詩作後便逃之夭夭。最終，自居風雅的他，最後仍然抵擋不

住權力中心的誘惑，前去北京優貢選官。由此可見，在炫示詩的名士，與迴避詩的士人之間，猶有許多在模糊地帶的詩人，士人們透過「詩」各自表述（或不表述），透露出在一個「詩」已失能的時代，個人追求的差別。

作者在楔子的王冕故事中早已埋下伏筆，雖然王冕成功與「名利」保持距離，維持了恬淡的隱士形象，但是敘事者在最後添上一句：「近來文人學士說著王冕，都稱他做王參軍，究竟王冕何曾做過一日官？」（頁14）意味著即使王冕不斷壓抑「詩」的名利性質，卻終究無法擺脫「名」的糾纏。而在對「詩」的熱情擁抱、有意迴避之間，名與利的誘惑不斷來回誘引小說中的士人，小說敘事者以「詩之隱形」批判了小說中的士人，藉「詩」取得金錢價值與社交利益，而忽略了詩原本抒情言志的功能。

（二）士人詩作的「生產途徑」與「詩體傾向」

敘事者「隱形」了小說中的詩作，以此批判「士人」與其作詩意圖。若進一步探討小說中的「詩」，從小說中敘述士人「學詩」、「作詩」的方式，可看出敘事者對於這些詩作「生產途徑」之批判。而小說中少數被引出的詩句中，則透露出敘事者對於士人詩作「詩體傾向」的批評。本節分析小說中士人詩作的「生產途徑」與「詩體傾向」，以觀敘事者對於士人作詩之批評。

1. 士人詩作的「生產途徑」

如上一節指出，小說中士人頻頻談詩、論詩卻被敘事者「隱形」，因此讀者不見其詩。若從小說中詩的「生產途徑」來看，主要有以下兩種類型：「詩會賦詩」與「偷盜詩作」。在還未習得作詩法門時，初學者依賴的是作詩的參考書，如匡超人雖未曾作詩、讀書，卻能在短時間從《詩話入門》中掌握訣竅，因而詩

會中與其他名士比肩。²⁰ 此中敘事者提出批評，「詩」本是表現文人心志的高度技術性藝術創作文體，卻淪為易學且能快速複製的模板文體。

學詩之後，士人便能與其他名士贈答；「詩會」為群聚詩人最有效的方式，透過聚集氣味相投的士人，或相談詩、或分韻賦詩創作，士人們因而能一顯詩才；詩會結束後，這些詩作也將被刊刻、流傳。從詩會的舉辦到詩集的刊刻，都不斷彰顯士人的「名」，士人甘願花費錢財舉辦風雅聚會，或依附如婁家的高門府第，使個人與群體的「名」相輔相成。小說中總共有六次的大型聚會，²¹ 其中兩次詩會為西湖詩會與鷺脰湖詩會，正如前文所指出，兩場詩會進行到結束，一首詩都沒有被敘事者引錄。

不論良窳，「工具書學詩」和「參與詩會」都是士人透過學習、演練作詩的方式；然而，另一種詩的生產途徑，是偷盜他人的詩作為己詩，並以此招搖撞騙。如上一節提及的蘧公孫偷取《高青邱詩話》刊刻，而名顯一時；或如牛浦盜竊已故詩人牛布衣的詩稿，行騙江湖，而最終以詩講學維生。另外一例是楊執中，小說中婁氏公子見到其詩是經由第三方（孩童）之手「無心」地交遞，因詩末的署名而確認為楊執中所作，並深深佩服其學養、襟懷；然而，此詩實為元代呂思誠（1293-1357）的七言律詩〈戲作〉，²² 敘事者卻並未在小說中提供任何明顯線索指出此詩的來源，並以刻意的隱瞞包裝楊執中的謊言。楊執中盜取、剪裁元代詩人作品為己用，已涉及欺瞞，因此，小說少見地引出了他的偽作：「不敢

²⁰ 「(匡超人)在書店裏拿了一本《詩法入門》，點起燈來看。他是絕頂的聰明，看了一夜，早已會了。次日又看了一日一夜，拿起筆來就做，做了出來，覺得比壁上貼的還好些。」同前註，頁 234。

²¹ 鄭睿衫指出詩會中的寫詩的功利價值，使與會者在意團體的和諧與穩固，而非個人寫詩的造詣，或與其他名士深刻的交誼，群體中的同病相憐是詩會運作的機制。鄭睿衫：《《儒林外史》人倫觀研究》，頁 152。

²² 元·呂思誠：「典卻春衫辦早廚，老妻何必更躊躇？瓶中有醋堪燒菜，囊里無錢莫買魚。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見元·陶宗儀（1329-1410）：《南村輟耕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頁 149。

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原本八句的律詩被簡化為絕句，敘事者有意隱藏此詩之來處，若未查索，讀者不可能發現其詩為盜取之作。

詩的生產途徑中，偷盜、欺騙是小說有意經營的手法。除了「偷盜」之外，小說中不少詩作並未解釋來源，但是確有負面的意圖。有趣的是，這些來路不明的詩作都被敘事者或短或長地引錄。小說中引出了七段無具體作者身份的詩作，²³ 包含前述楊執中剪裁、挪用元代詩人呂思誠之詩，與第十一回中被點評者認為是「抄來」的對聯，其他的如第十一回乩童自稱靈驗，先以二句詩自稱起乩靈驗，甚至能請下皇帝，再以一首詞奉承王員外能勝任宰相，雖不至欺騙，卻也難脫逢迎之意；第十五回中洪憨仙藉詩詐欺馬純上，敘事中雖未明確指出此詩為洪憨仙所作，但他以詩中內容誣稱「南渡」而來已三百年，明顯是以「詩」作為欺瞞手段；第二十八回中季葦蕭的對聯詩作者不明，他卻以此詩作為隱瞞眾人已有家室的重婚理由；第五十四回的詩句作者究竟為誰，則是二角色不斷爭辯的重心，且最終並無定論。

從詩作的「作者」與「賦詩動機」觀之，敘事者對這些詩句的「寬容」引述自有其深意。八段詩詞的作者身份相當可議，小說敘事引導讀者相信這些詩作為小說人物所作，卻又以曖昧的手法暗示這些詩句的問題重重。對於詩之「作者」的故意混淆與錯置，是作者有意的設計。綜觀來看，小說中僅有的七段詩句

²³ 《儒林外史》全書中其實引出了八首不盡完整的人物詩詞（除去第四十四回引用的郭璞詩作），分別為第七回乩童（陳和甫）詩詞二段（頁 98-99）。第九回楊執中詩：「不敢妄為些子事，只因曾讀數行書；言雙烈日街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頁 126）。第十一回中楊執中對聯（頁 150）。第十五回洪憨仙之詩：「南渡年來此地遊，而今不比舊風流。湖光山色渾無賴，揮手清吟過十洲」（頁 193）。第二十八回中季葦蕭入贅尤家門口的對聯：「清風明月常如此，才子佳人信有之」（頁 346）。第二十九回蕭金鉉春遊之作的其中二句：「桃花何苦紅如此？楊柳忽然青可憐」（頁 361）。第五十四回中丁言志指為趙雪齋的詩句：「湖如鶯脰夕陽低」（頁 655）。

(除去郭璞之引詩)，有五首牽涉欺瞞行為或作者不明，兩首有自誇之態。詩作者的模糊，加上意欲炫示、欺瞞的引詩目的，都可察小說作者對賦詩者與引詩的批判。

2. 士人詩作的「詩體傾向」

若從小說中七首引詩作／句的體裁來看，明顯有其共同處，即皆為「七言」詩，且其餘小說人物的「創作」多半都是採用絕句、律詩的「近體」，而非「古體」；而以美學品味視之，這些引詩皆非佳作，誠如杜慎卿對蕭金鉉詩的評語，詩有「加意做出」的不自然感，因此意味索然。由於此些詩中多帶有相當的欺瞞、炫示意圖，而非表現個人情志之詩，不免在品味上落入下風。由此可推知《儒林外史》敘事者對於七言的時下之詩顯然無甚好感，因此小說中熱愛賦詩、談詩的名士多以「時詩」為主，以此對這些士人進行諷刺敘述。敘事者對「時」詩提出的批判也在此，小說以寫人物輕易將詩都「做了出來」，而只自學一日二夜的匡超人甚而自忖作得比詩友更好。「詩」走向簡易與速成的生產模式，暗示品質低落，如匡超人敏銳地察覺詩友作的詩沾染了「時文」氣，詩句裡摻雜「且夫」、「嘗謂」一類文章批語，顯得不倫不類。由匡超人的視角，敘事者讓讀者看到時下文人對待「詩創作」的便宜行事，以及「時詩」的諸多弊病。該時代的「士」與「時詩」是為作者批判的重心。

由詩體來看，與「時詩」對立的是「古詩」，在牛浦盜詩的段落中，有段饒富意味的敘述：

將這兩本書，拿到燈下一看，不覺眉花眼笑，手舞足蹈的起來。是何緣故？他平日讀的詩是唐詩，文理深奧，他不甚懂；這個是時人的詩，他看著就有五六分解的來，故此歡喜。(頁 263)

牛浦的喜悅來自於「讀懂」詩之成就感，未曾上學的一介貧民，竟然「一看」便能對知名詩人牛布衣的畢生心血之作有「五六分解」。此一批判指向二者，分別是詩人牛布衣及「時詩」；在詩壇中大有名氣的詩人之作，或許不如士人所一味所稱道的，反而可能也如匡超人等人的詩作，易學而速成。「時詩」生產方式的改變，是相對於「古詩」，由敘事者提供的資訊得知，牛浦過去讀的「唐詩」因「文理深奧」難解，因此相形之下「時詩」則親近易懂。敘事者以牛浦的喜悅諷刺「時詩」的膚淺，而較抬舉「唐詩」深奧的文辭與理趣。而從第四十回中蕭雲仙深受「五言古風」的詩所感動，甚至前往尋找作詩者，並將生平功業交付之的敘述中，可以看出在泛稱「古」詩的所有詩類型中，敘事者似乎更崇尚「古風」及唐宋「近體」多於明清「時詩」，²⁴ 且「五言」優於時興的「七言」。

《儒林外史》的種種線索展現了敘事者崇古抑今的傾向，不僅是對「詩」之古風的追求，小說中角色對古代人物、事蹟的仿擬與再現，²⁵ 都可見作者對古代典範的嚮往，而有了今不如古的哀嘆。²⁶ 藉由古今對照，作者嘗試對「時」提出詰問——「詩」究竟能否恢復往昔的純樸光彩？仿效古代隱士、詩人，以詩呈現個人真誠的心志，而非以詐偽為目的的文體？此類「今不如古」、「人心不古」的感嘆在小說中被反覆強調，而敘事者尖銳指出時下詩人的劣行、時下詩作

²⁴ 敘事者以旁人的負面敘述，描述景蘭江反覆吟詠「清明時節雨紛紛」等詩作，呈現俗氣的詩人形象。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頁 239。

²⁵ 商偉指出王冕以「段干木」、「泄柳」兩個古代故事作為隱居不仕的仿效對象，即是一例；另分析小說中婁氏公子對史傳「三訪賢者」模式的仿效、權勿用的高人戲仿、張鐵臂對古代俠客的模擬、匡超人與孝子傳的關係，認為這類戲仿經典都是對歷史敘述的質疑，使得過去與現在斷裂，並使得規範與實踐產生動搖。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266-286。

²⁶ 如小說以時文選家馬純上一角對「古」與「今」進行辯證，如馬純上詢問店家自己所選的文章銷售如何時，店主以「時文」比不上「古書」的輕蔑之語打發之；又如馬純上不識李清照、蘇若蘭、朱淑真等名詩人，以及誤信詩詞而遭騙徒以詐財等情節，都透露作者對時下文人古學低落的批判。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頁 188-189

的品質低落，呈現出如楔子中王冕所預示「一代文人有厄」，甚至「天下將亂」的景象，此一診斷指出「時」的特殊性，已遠離過去讀書人的純樸心態。

本節第一小節討論「士人對詩的態度」，第二小節分析士人詩作的「生產途徑」與「詩體傾向」，可見小說敘事者對於「士」風日下的批評。由於詩成為多數士人爭名逐利的工具，因此敘事者將之「隱形」，以諷刺目不識詩的士子，並寄託對此時古風不再的感嘆。

三、史與詩：小說中「詩」敘述的歷史寄寓

上節提及《儒林外史》敘事者對於「時人」、「時詩」的批評，若放在整部「外史」的脈絡下，呈顯了小說對歷史的關注。回到小說序言：「夫曰外史，原不自居正史之列也，曰儒林，迥異元虛荒渺之談也。」（頁 687）閒齋老人指出《儒林外史》雖非正史，但也非虛構作品。由於能達到「風俗教化」之旨，而成為另一種「史」：「稗官為史之支流，善讀稗官者可進於史。故其為書亦必善善惡惡，俾讀者有所觀感戒懼，而風俗人心庶矣維持不壞也。」（頁 687）閒齋老人引用了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善善惡惡」的史之功能，認為讀《儒林外史》能使讀者自警，因此不同於四大奇書，是真正能以「稗官」進於「史」者。此段序言呈現了《儒林外史》自身定位的游移：若以「小說」看待，其結構與內容的確為白話章回小說，但讀者難以忽視這部作品對「明史」屢屢提出的不同意見，如對元末明初王冕（?-1359）、吳王朱元璋（1328-1398）、方孝孺（1357-1402）等的敘述，其他細碎談論如關於王世貞（1526-1590）、李攀龍（1514-1570）、謝榛（1499-1579）、宗臣（1525-1560）之人物言談也被收入小說。²⁷ 小說以不同立場評價歷史事件與人物，透露出敘事者對歷史的關注，而前述序言中將此書

²⁷ 同前註，頁 169。

視作「史」的意圖也與「小說」文體有所區隔。若以「史傳」視之，它的記史座標並不明確，樂蘅軍認為此書為一部「秀才史」，收納了這些無法進入正史的士人；商偉也指出《儒林外史》可視作一份「編年長卷」，含納了未能符合正史描述的儒士，然而它的「時間觀」不同於史傳時間，小說人物的形象隨著作者的當代時間，導致形象不斷變化，無法如史傳有一明確定論，因而造就了一部「沒有『歷史意義』的編年史」。²⁸

以「史」及「小說」二文體而言，前者所追求的是王朝興衰的客觀記錄，自然不可能包含詩詞等個人抒情的文字，那麼《儒林外史》的無詩實屬合理（雖仍難將之視為正史），不過小說中士人故事頻頻提及「詩」作卻不被引出，因而使讀者合理疑之；後者雖為敘事文體，但卻經常運用「詩筆」進行評論與情節預示，從六朝小說、唐小說到宋元話本、明清白話小說都可見之；然而《儒林外史》卻一反之前的白話章回，將「敘事者聲音（詩詞）」壓到極低，如此作法使它有別於白話章回小說的傳統。

本節以《儒林外史》的「詩」切入，探討其與「史」、「小說」的關係。首先分析小說中「敘事套語」的隱去與體式改易；再由小說士人以詩留名的渴望，以及混亂的「詩」史編年，分析「詩」所乘載的記史功能，以理解敘事者對於「詩」與小說文體的看法。

（一）敘事套語的隱去與改易

在小說人物引詩外，《儒林外史》也有意識地刪去了章回小說敘事者的「詩」聲音，這種說書套語常見於白話小說中，商偉指出《儒林外史》一反傳統白話小

²⁸ 商偉指出《儒林外史》透過多種手段質疑了正史的記載，如藉由「時間」使得小說人物前後進行變化，打破了史傳與編年史的人物不變傳統，或直接對王冕故事進行改造，依違於史稗之間。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169、193-194、197。

說的敘述，不再讓全知敘述者承擔無可懷疑的道德權威，作者使全知敘述者引退幕後，讓小說人物各自發聲。²⁹

權威敘事者的隱身主要表現在「傳統說書人的消失」上，不僅使說書人議論、虛設對答被消音，也呈現在小說刻意隱去的「詩」套語中。傳統白話小說倚賴說書人身份的敘事者，以「篇首詩」、「篇尾詩」與小說情節間的詩引導讀者掌握小說意旨。「篇首詩」具有概括全書、點明題旨、預示情節，與烘托氣氛等功能；「篇尾詩」則以覆述、議論與說理為導向。短篇話本小說與中長篇白話章回小說的篇首詩至中晚明漸有固定化、格套化（詩曰+七言）、詩詞齊整的傾向；而篇尾詩大致如前者，小說中逐漸有定型的趨向。³⁰ 在篇首詩、篇尾詩之外，中長篇章回小說的「卷頭詩」、「回末詩」也大致呈現相似的嬗變模式。這種固定化、格套化的詩套語，直到清中葉後漸漸被以散體代之，減少以詩詞開篇、收尾的方式，過去皆以此為小說走向文人化、案頭化的現象。《儒林外史》成書於乾隆十四年（1749），正是此時期；然而，本文認為，《儒林外史》敘事者詩聲音的消失固然可從小說形式變化流變視之，卻也不能脫離敘事者對「詩」的針砭來論，是作者有意的設計。

《儒林外史》仍維持了低度的章回小說形式：七字雙句的回目、卷頭詩（詞）、回末詩（詞）與每回末尾「只因這一番，有分教」、「不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的說書套語。然而，不難發現，此類說書語與傳統章回小說的敘事者有極大的不同，讀者已聽不見敘事者熱切、激動的聲音。敘事者取消了小說中人物的詩與敘事者的詩，明顯拒絕以詩（包含詩詞曲賦等）作為小說的權威話語，詩不再擔當人物形象烘托、氛圍營造及預示情節的功能。這種敘事者詩的缺席，可視為

²⁹ 商偉認為《儒林外史》在缺乏權威敘事者的狀況下，小說人物的道德言說與功利行為的相左呈現了作者試圖在權威敘述之外尋求的道德想像。同前註，頁 20-23。

³⁰ 梁冬麗、曹鳳群：《通俗小說「有詩為證」的生成及流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 年），頁 182-207。

清中葉文人小說家擺脫說講韻文的理由。但即使以此為由，文人作者也沒有改以「散體文」進行描述、預示、議論、評點，而是完全拒絕干預敘事。篇首詩（詞）、篇中詩（詞）完全被刪去，敘事者也將篇末詩（詞）改易為四六字句的白話敘述，拒絕以詩（詞）為敘事者的聲音，與小說中人物詩的「隱形」有相似之處，與敘事者排斥時下詩（詞）的傾向可相呼應。

在篇中敘事套語的刪改之外，小說保留了最低形式限度的頭尾二闕詩詞：「卷首詞」與「卷尾詞」，其中展現著強烈的「時」的感嘆：

人生南北多歧路，將相神仙，也要凡人做。百代興亡朝復暮，江風吹倒
前朝樹。功名富貴無憑據，費盡心情，總把流光誤。濁酒三杯沉醉
去，水流花謝知何處。（頁1）

評點者認為此詞「真乃喚醒夢夢」（頁700），點醒百代以來的士人汲汲於功名富貴追求的無力感。詞中表現初敘事者歷盡滄桑後，對於過客興亡的感嘆，上闕以宏觀視角縱談世之興衰規律，表達衰亡之嘆；下闕則立於當代的「時下」，講追求功名富貴的無常與不易達至，詞最終收結於即時醉酒行樂的告勸，以免虛度光陰。敘事者在詞後指出，此詞為「老生常談」，但黃評認為「固係常談，而先生之書非常談也。」³¹ 在興衰規律的「常」中，詞中強調的是處於「當世」的無常與非常。而卷尾詩為一闕〈沁園春〉：

記得當時，我愛秦淮，偶離故鄉。向梅根冶后，幾番嘯傲；杏花村里，
幾度徜徉。鳳止高梧，蟲吟小榭，也共時人較短長。今已矣！把衣冠蟬
蛻，濯足滄浪。無聊且酌霞觴，喚幾個新知醉一場。共百年易過，

³¹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頁1。

底須愁悶？千秋事大，也費商量。江左煙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頁 684-685）

作者自述平生，「鳳」、「蟲」與「時人」之壽有小大之辨的意味，也抒發對「時」的感嘆。末尾處，詞人決定終止對世俗時間的追求。以「百年」、「千秋」的宏觀視角，拋卻當下的愁悶，而那些記憶中的時光，勉以「殘編」為錄。最終皆捨之，轉而修佛忘空。敘事者以此個人色彩濃厚的詞，抒發感懷，與卷首詞的題旨相和，因此齊評曰：「以詞起，以詞結，全面照應」（頁 684-685）。前後二詞都顯示出小說對「時」的關注，「當世」正是作者放棄追尋功名富貴的時間點，顯示出當下的士人與時代之變。

上一節曾提及敘事者對「時詩」的批判，與嚮往「古體」、「唐宋近體」的詩偏好。而從敘事者將篇首尾詩詞的刪除、代之以白話的作法，以及卷首尾詩中透露的「時」之意識，或可推衍為敘事者對於此時代「士」與「詩」的關切。在四大奇書的討論中，李志宏認為此四部小說是在儒家政治理想衰落時代出現的作品，目的在於寄寓小說以重建理想人文秩序。³² 本文認同李氏之說，以為《儒林外史》同為類似的文人小說脈絡，且更加強調「時」之意識，使得作品呈現出對「士」與「詩」無力的悲觀基調。敘事者透過上述人物「詩」與敘事「詩（詞）」的操作，指出文人衰世中士人所面臨的危殆。

當士人難以保有「詩」與心志的真誠，史籍也無法分辨士人良窳。那麼，處於這個時代的儒林士人究竟如何才能留下生命的價值？「外史」或成士人最終的依託。

³² 李志宏：「文人作者有意識地進行通俗話語的展演，目的在取義風教：「四大奇書各自展演了一種『關於世界及其結構和進程的清晰的體驗和思考模式』，並為讀者提供了一種『政治寓言』的想像空間」見氏著：《《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頁 34-35。

(二) 以詩記史

小說中多數人物的進場是以聚談、相遇等方式插入敘事中，由於敘事者是從人物的「當下」開始記錄，對人物過往生平並未詳作解釋，因此讀者對人物的理解常常是「半生」為頭認識之，且小說時常只給了人物「當下」的切面，隨後就離開主要敘事。然而，小說中有兩個人物是從出生、家世起始，以類似「史傳」的方式，詳細記錄成長經過的，可見在這部假託「外史」的作品中有提綱挈領之效，二者分別是楔子中的王冕與第三十六回的虞博士。³³ 虞博士的降生，與王冕在首回中見天有異象時，預言「一代文人有厄」有所呼應。從王冕視角中，「天上紛紛有百十個小星，都墜向東南角上去了」(頁 14)。他將小星指認為一夥「維持文運的星君」，並解釋為「天」的憫恤之意。果真如其所示，小說在第三十六回迎來了一位降生在「應天」蘇州常熟縣「麟紱」鎮的虞育德，敘事者描寫他在泰伯祠大祭中擔任主祭，撐起了書中骨幹，象徵南京文人試圖在功名之外，追索的禮儀實踐。虞博士與這場盛大的儒禮祭典，似乎是對於南京士人頹靡心情的一次拯救，在這部「儒林外傳」中是極其重要的事件。

相較北京的政治權力中心，南京多匯聚不遇的士人，是儒林的外緣。小說在第三十七回的泰伯祠祭典後出現了山林、鄉野、邊疆一類更「邊緣性」的場景，如郭孝子穿山越嶺尋父、湯鎮臺大戰野羊塘苗酋、蕭雲仙救難明月嶺等。對於南京文人來說，泰伯祠大祭一類事蹟，雖然未必能載入史冊，至少使這些儒士的禮儀典制能被時人記得；然而，對於處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帶（北京、南京）的文人來說，此處鮮為人注目，遑論史籍記錄。不過，小說卻特別記錄邊境之士人，其中富有意義的是蕭雲仙的故事。

³³ 陳文新：「吳敬梓寫虞博士，與寫王冕一樣，正面立傳，原原本本地交代其履歷，這在《儒林外史》中屬於特例，即使是杜少卿，作者也未曾如此鄭重。」見氏著：《解讀儒林外史》（臺北：雲龍出版社，1999年），頁 19。

蕭雲仙投軍參與松藩衛邊境軍隊與生番的戰爭。當二位都督討論戰略時，他表示青楓城有豐美水草可供牲口食用，並以史書的知識佐證自己的推測，卻遭到斥責，都督否定了史書的記載。後受命領軍對抗番子，驚險攻城得勝後奉令築城、屯墾、立禮儀、興學，治理化外之地，因而有一番太平光景，眾百姓以立祠祀表達感激。然而，朝廷卻以浮開銷銀為由要求蕭雲仙個人還款朝廷，賠光家產仍不足，屢遭地方官追討。身心俱疲之時，敘事者卻以一首「詩」撫慰他的挫敗感：

樓右邊一個小閣子，牆上嵌著許多名人題詠。蕭雲仙都看完了。內中一首，題目寫著〈廣武山懷古〉，讀去卻是一首七言古風。蕭雲仙讀了又讀，讀過幾遍，不覺淒然淚下。木耐在旁，不解其意。蕭雲仙又看了後面一行寫著：「白門武書正字氏稿。」看罷，記在心裏。(頁 497)

蕭雲仙深受此詩感動，淒然淚下。他隨後前往京城尋此作詩者，打聽之後作詩者武書回訪：

武書道：「昨日枉駕後，多慢。拙作過蒙稱許，心切不安。還有些拙刻帶在這邊，還求指教。」因在袖內拿出一卷詩來。蕭雲仙接著，看了數草，贊歎不已。隨請到書房裏坐了，擺上飯來。喫過，蕭雲仙拿出一個卷子遞與武書，道：「這是小弟半生事跡，專求老先生大筆，或作一篇文，或作幾首詩，以垂不朽。」(頁 498)

蕭雲仙見了題詠於壁的「懷古詩」，深慕作詩者，盼能請託武書為己半生事蹟作詩文傳世。他打開「西征小紀」的卷軸，裡頭記錄了自己「椅兒山破敵」、「青楓取城」、「春郊勸農」詳細的事蹟，武書讀畢也深感佩服，而言：「這做詩的事，小弟自是領教。但老先生這一番汗馬的功勞，限於資格，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

了，須得幾位大手筆，撰述一番，各家文集裏傳留下去，也不埋沒了這半生忠悃」（頁 499）。他樂意為武書的功業作詩，卻擔心只以「詩」形式記錄恐埋沒了偉大的事蹟；不過蕭雲仙仍執意請武書以「詩」記錄自己的功績，希望能以此留名不朽。武書答應了，也推薦他訪幾位作詩的大家，盼能以「詩文」題詠這一番恐遭「史書」忽略的事。

由蕭雲仙故事的前後對照，敘事者尤其在意「史」究竟要以何種形式記錄、流傳。先以「史書」對邊緣地區的記載真偽為提問，從中可見蕭雲仙對「史」的熟稔與堅信；再寫蕭雲仙試圖以「詩」記錄這一番在「正史」邊緣的功勞。他致力於儒家事業，如區辨夷夏、立定儒禮祭儀並敦俗勸農；符合《詩》教，正統的儒禮實踐者卻遭到朝廷的不信任，甚至散盡家產賠償國家。蕭雲仙完全被朝廷忽略的努力，終於在武書的「題詠詩」中看見一線曙光，並得到詩人的允諾，可將他幾卷的功業與報效家國的心志安頓在「詩」裡。誠如武書所言：「限於資格，（按：蕭雲仙）料是不能載入史冊的了」，相較於位處於廟堂之上的北京文人，蕭雲仙等是一群被拋擲到邊緣地帶的文人，即使胸有大志，卻因被權力中心排斥而無力施展，遑論受到史書的記錄與表彰。對他來說，正統的、核心的「史書」已經無能佐證他的生存意義；在無比的失落之中，於是盼能以「詩」作為青史留名的可能。

爬梳全書人物對於「詩」的態度，在滑稽名士們眼中，詩是博取名利的手段；對於迴避詩的士人而言，詩則是興趣所致，但要避免如前者過度以詩炫示。不論是對詩的熱衷或者刻意的節制，都指向敘事者對「詩」的疑慮；然而，蕭雲仙的敘述中，先是對壁上題詠詩「讀了又讀」，而後「淒然淚下」，深受感發，並不畏困難地前往尋人、拜會，請託為己記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事蹟。敘事者藉由蕭雲仙重新肯認了「詩」的價值，即便「詩」已成為許多士人騙取名利的工具，

但在流離失所之際，蕭雲仙仍然盼能以「詩」為生命記「史」，「詩」遂被暫時賦予了記錄生命、安頓士人精神依歸的功能。

樂蘅軍認為《儒林外史》呈現了士人的集體流離漂泊，收留流浪文人的南京，與權力中心北京對立。南京士人承受的壓力主要有二，一是基本物質的嚴重匱乏（飢餓），一為精神上的不得要領（失意），如牛布衣持著自己的詩集漫無目的地流浪，病死於荒庵；偷詩的牛浦郎冒名頂替牛布衣的身份，寄食四方，雖然因而獲得名利，卻失去自己的名字，最終完全地丟失了本來的自己。³⁴ 誠然，《儒林外史》拒絕以功名為刻度，敘寫儒林大小人物的精神史，以儒林士人的漂泊故事為敘述對象。當小說人物反覆地吟詩換取名利，或追求科舉功名時，作者在小說後段的邊緣地帶，憐憫地以「詩」為蕭雲仙記錄「士」之生命意義，暗示著在小說中大量「詩」的寫作中，尤有博取名利以外的功能。「詩」成為治癒虛無感的一帖藥劑。回末詞有言：「江左煙霞，淮南耆舊，寫入殘編總斷腸。從今後，伴藥爐經卷，自禮空王。」（頁 814）江淮煙霞與士子百態，既然難以記入正史的，遂將一切的虛空與愁悶以「外史」、「殘編」記之。寬憫而視，「詩」不僅是杜少卿、莊紹光、虞博士、武書等人安放心靈的所在，也使得小說中追逐名利的滑稽士人能夠暫時獲得精神勝利式的「名」，得以記於假託「外史」的「小說」中。

小說末尾，此時距前幾回已有多年光景。丁言志與陳和尚因閱讀前人刊刻的詩會詩集而發生激烈爭吵，³⁵ 原因在於丁言志聲稱此詩集為「鶯脰湖詩會」後的刊刻作品；然而若對照小說第十二回中鶯脰湖詩會與第十八回西湖詩會場景，可知丁言志似乎混淆了二次詩會的作詩者與詩篇；尤有甚者，他將不會作詩的名士安上了詩名，不曾在敘述中作詩者也被認為作了詩，並且堅持「有詩為

³⁴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頁 170-171。

³⁵ 陳思阮自稱為鶯脰湖詩會中詩人陳和甫之子，因此幾度反駁丁言志的說法，卻遭對方指稱冒充身份。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頁 655-656。

證」。³⁶ 原本在小說前面的敘事中被嘲笑的士人，在此都成了會作詩的大名士，且稱有作品傳世。

這段爭執固然可視為作者對「詩」與「士人」真偽不分的諷刺，卻也能解讀為小說作者對這些焦慮士人的寬容。由於生存在無法出頭的壓力下，只能故作姿態地吟詩自賞，而這些詩竟然真能編成詩集流傳後世，以「詩」保有他們的「名」。此時「詩」的良窳、「詩」作者的真實身份不再重要，且由於詩已被敘事者「隱形」，這些名士得以避開劣詩的尷尬。原本不可能被載入史冊的士人（其職業紛雜，如醫生、巡商、時文選家、帽子店主、生員），都被以「詩名」記錄於外史末尾。士人的流浪漂泊、詩人的貧病而死，在此部「儒林外傳」的憫恤下，因而能得到暫時的安頓。

小說最末回，開頭描寫南京名士四散與病亡，此時即便「行禮樂」如顏回、曾子，或「做詩文」如李白、杜甫，³⁷ 都再也無法得到合宜的肯認，儒林徹底走向了功名利祿的逢迎揣合，正是楔子中王冕所預示的衰世。不過，小說引出了市井四位奇人，他們雖以低賤的工作維生，卻沈浸於書法、棋藝、詩畫、琴藝之中，避免小說中士人所追逐的功名、利益。如以裁縫為業的荊元，愛好作詩卻拒絕與詩壇來往、善作詩畫的蓋寬，則寬厚地與底層詩人為伍而不以為恥，散盡家財後仍不改其志，繼續於居陋巷讀詩畫畫。在此，「詩」成為他們的志趣，不再是換取名利的工具，並且能在他們生活陷入困境時，維持穩固不變的價值。末回市井四奇人的處世態度，可說是作者吳敬梓在整部《儒林外史》之後，對「詩的功利化」嘗試提出的解決之道，回應楔子中王冕對於詩與名利掛鉤的擔憂。

³⁶ 小說第十七回目雖以「趙醫生高據詩壇」，然而趙雪齋不僅沒有在丁言志聲稱的鶯脰湖詩會出現，甚至在敘事中也無賦詩的敘述，此詩恐非其所作，且丁言志手中的詩冊也非鶯脰湖詩會的紀錄，丁言志對作者、詩會的混淆誤認都說明了整部《儒林外史》中引詩的曖昧性。同前註。

³⁷ 同前註，頁 665。

市井四奇人對琴棋書畫的詩意追求，回應文人在物質生活匱缺、社會聲望低迷之下所生的憤懣。小說末尾收束在詩人荊元所彈奏的哀音：

荊元席地坐下，于老者也坐在旁邊。荊元慢慢的和了弦，彈起來，鏗鏗鏘鏘，聲振林木，那些鳥雀聞之，都棲息枝間竊聽。彈了一會，忽作變徵之音，淒清宛轉。于老者聽到深微之處，不覺淒然淚下。(頁 673)

詩人所奏的哀音迴盪在山林裡，無人聞問，只有寥寥知音與鳥雀共鳴。市井四奇人的遺世獨立絕非自然，他們對琴棋書畫與詩的興趣，是邊緣文人嘗試安頓自我的方式。詩人彈奏的琴音透露出文人的淒苦與失落，一訴士人無力扭轉的困境。

(三) 隱形的詩與無效的史

「詩」的記錄雖讓士人聊以自慰，然而，這種記錄並不能載於真正的「史冊」裡。回到本節初提及丁言志與陳和尚的爭執，他們對這本買來的「鶯脰湖」唱和詩作起了口角，將詩名與士人顛倒錯置的鬧劇，牽涉的是小說內部的「歷史」。這一回（第五十四回）已到小說末尾，與第十二回的鶯脰湖詩會、第十八回的西湖詩會已相距甚久，陳和尚反駁丁言志之言，是以「父親之言」描述當時場景，證明丁語為誤。他指出父親與鶯脰湖詩會的主人婁氏有交誼，因此參與者是楊執中、權勿用、牛布衣、蘧公孫、張鐵臂等人，並非西湖詩會的趙雪齋、景蘭江一流。丁言志則以詩中有「鶯脰」二字，堅稱此必為鶯脰湖詩會詩作。隨後兩人的爭吵在於對方是否「見證」這段史事：

陳和尚道：「這一本詩也是匯集了許多名士合刻的。就如這個馬純上，生平也不會作詩，那裡忽然又跳出他一首？」丁言志道：「你說的都是些夢話！馬純上先生，蘧駝夫先生，做了不知多少詩，你何嘗見過！」陳和

尚道：「我不曾見過，倒是你見過！你可知道鶯脰湖那一會並不曾有人做詩？你不知那裡耳朵響，還來同我瞎吵！」丁言志道，「我不信。那裏有這些大名士聚會，竟不做詩的。這等看起來，你尊翁也未必在鶯脰湖會過。若會過的人，也是一位大名士了，恐怕你也未必是他的令郎！」陳和尚惱了道：「你這話胡說！天下那里有個冒認父親的？」(頁 655-656)

小說讓二人爭辯見證者的「在場」，進而質疑對方的家世為偽，甚至鬧指對方為「假名士」。這段因「詩」而起的爭論，表現出小說人物對於當代事件／史事真實性的混淆與誤會。陳和尚與丁言志並不在詩會現場，自然不可能見證之，因此以詩、聽聞臆測其事。在此之中，唯一能佐證詩人在場的只有「詩」本身，但由於整本小說中「詩」與「詩」作者的不確定性，使得這場詩會、詩作與與會者的真偽都難以證明。這也意味著記錄往事／史的失敗。

前述蕭雲仙故事裡，他在戰前對史書記載表現出全然的信任，卻遭到兩都督的質疑：「蕭雲仙道：『卑弁在史書上看過，說這地方水草肥饒。』兩都督變了臉道：『那書本子上的話，如何信得！』蕭雲仙不敢言語。」小說人物表達對史書記錄的不信任，對比蕭雲仙想留名於史書的渴望，卻終究失落了。蕭雲仙記錄「西征小紀」捲軸，「前面寫著「西征小紀」四個字。中間三副圖：第一副是「椅兒山破敵」，第二副是「青楓取城」，第三副是「春郊勸農」。每幅下面都有逐細的紀略」(頁 499)。蕭雲仙的功績事略，終被史書排除在外，表示著歷史話語的失落。「史書」無法記錄士人重要的生平事蹟，使得「士人」之志無處安頓，是對「士」之否定。而小說後段陳和尚與丁言志的爭論，則表現出土人故史的混淆與亡佚。另一方面，小說又對歷史話語有相當的執迷，不管是以小說人物對明史做出立場不一的短評，或是使人物不斷戲仿歷史文本。然仔細觀之，小說中對於吳王、寧王、方孝孺等明史重要人物的批評都在眾人閒談之中。這些片段、瑣碎的言談難以形成歷史論述；而小說人物對古代經典文本的戲仿，如商偉分析婁

氏公子模擬《史記·魏公子列傳》、《三國演義》尋賢、權勿用複製古代隱士形象、張鐵臂仿擬古代俠客文本等，³⁸ 也都是失敗的諧擬，滑稽地令人失望，此皆顯示出這個時代歷史話語與古典範本的失能。正如劉柏正延伸許暉林對馮夢龍的「知音」議題的推論：

正是由於傳統文學（不論是詩詞，或者歷史敘事）已經無法保證儒家話語及其體系的穩固，小說家才必須通過建構白話小說這樣一種敘事文學的型態來確認「知音」依舊存在。³⁹

劉柏正指出，詩詞、歷史敘事這類儒家話語已不如過往穩固，而「白話小說」這種文體正是小說家用以重新尋覓知音的方式。回到《儒林外史》，小說中人物的「詩」大多被以「隱形」的方式批判，而小說人物對歷史的仿擬嘗試盡皆失敗、失效，小說人物有關史之談論不僅破碎，且真偽難辨。在這樣一個缺乏權威敘事者聲音的小說中，小說敘事者藉由多聲調的「白話小說」敘事文體，找尋他的理想讀者，並且考測讀者對於「詩」的品味認知——正如同小說中詩壇祭酒杜少卿迴避作詩、談詩的態度，透露出「知音難尋」的嘆息。

作者在此尖銳地暴露「詩的隱形」與「歷史話語的無效」，因此更展現了《儒林外史》的意圖。在一個充滿「文人之厄」（王冕語）的時代，當士人以詐偽手段謀求功名富貴時，已偏離過往古聖先賢的典範行止。過往敘述往事的「史書」再也無法作為士人的仿效對象，而抒情、言志的「詩」也已無法表現人的真誠心志。「史」與「詩」都走向虛美、隱惡的功利性目的，「小說」遂為記錄這群被排斥於「儒林傳」之外之士人的最佳文體。雖云「小說」，但已不再是六朝的叢殘小語，五十餘回的白話長篇章回中包含了各種文人故事，還有不能入於史的軼

³⁸ 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266-286

³⁹ 劉柏正：《讀史與述事：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 年），頁 162。

聞、時事、笑話，與對古代文本的戲仿。《儒林外史》不強調「述往事、思來者」，也不直接以說書人姿態褒貶人物是非，而是描寫作者所處的當代，兼容並包地收錄。小說中形象不斷變化的人物，拒絕被史傳「蓋棺論定」，⁴⁰ 因而在小說中得以允許自由發聲，陳述個人的生命史。或可謂「史統散而小說興」，商偉曾指出吳敬梓以小說嘲擬歷史宏大敘述的失效；而本文以「詩」觀之，小說表達了對「抒情」文體的失望，以及對史之質疑。刪去「詩」，也擺脫「正史」的典正姿態，白話章回小說的形式因而得以記錄士人的「外傳」，表達作者對於文人衰世的寄寓。

四、結語

本文探討小說中詩的「隱形」現象，從詩的金錢、社交、精神三個面向，分析詩的功能與價值，歸納小說中兩類士人看待詩的態度。多數士人著眼於詩帶來的名利價值，因此大量作詩、談詩。「詩」在文藝市場與社會的名利價值，催生出此類士人名氣與聲望；另一類士人如杜少卿等，則試圖迴避作詩、談詩的社交場合，避免將「詩」與名利價值掛鉤。他們對「詩」隱晦、低調的愛好，是對士人以「詩」逐名的警覺與反省。小說中對詩「生產途徑」的揭露，如「以工具書學詩」、「參與詩會」、「挪用古人詩詞」、「盜取、刊刻其他詩人之詩」等，以及小說中對於「時詩」淺薄、易解的描寫，都可見敘事者對於此時期「詩人」與「詩」的批判。正如楔子中的王冕故事——愛好詩畫卻難以擺脫其中名利之牽絆，在一個「士人」與「詩」的良窳、真偽皆混雜不分的時代，「名利」成為士人競逐的目標，是為敘事者筆下的士／詩之危機。

⁴⁰ 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頁 193。

小說敘事取消並改易了敘事套語（詩詞），拒絕作為這部「外史」士人的評價者，而從卷首尾詩詞可見敘事者對於士處於此「時」之關切。在這部儒林外傳中，由於缺乏權威敘事者，小說角色需各自發聲，展演生命價值，如人物蕭雲仙表現出以「詩」記錄個人生命事蹟的渴望。在此「詩」的確短暫安慰了士人對於自我實現的渴望與焦慮；然而，敘事者以「隱去詩作」為敘述策略，使「詩」、「詩人」與「詩會」這類往事記錄都變得混亂難辨，顯示出「詩」與「史事記錄」的失效。而小說人物瑣碎的歷史評論，與失敗的歷史仿擬，也呈現出歷史話語的不穩固。當抒情的「詩」與典正的「歷史」這一類儒家話語都走向衰落時，小說家因而以此部講述「儒林故事」的白話小說，寄託對文人衰世的悲懷。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年。
- 清·吳敬梓著，李漢秋輯校：《儒林外史彙校彙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二、近人論著

(一) 專書

- 李漢秋：《儒林外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
- 李志宏：《《金瓶梅》演義：儒學視野下的寓言闡釋》，臺北：學生書局，2014年。
- 高友工：《中國美典與文學研究論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年。
- DOI:10.6327/NTUPRS-9789860282184
- 陳文新：《解讀儒林外史》，臺北：雲龍出版社，1999年。
- 陳美林：《吳敬梓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
- 商偉：《禮與十八世紀的文化轉折——《儒林外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0年。
- 梁冬麗、曹鳳群：《通俗小說「有詩為證」的生成及流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5年。
-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樂蘅軍：《古典小說散論》，臺北：大安出版社，2004年。
- 顧鳴塘：《《儒林外史》與江南仕紳生活》，上海：商務印書館，2005年。

(二) 期刊論文

- 王鴻泰：〈名士值幾文錢？——明清間士人的挾藝交遊與名利經營〉，《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0期，2018年11月，頁115-162。DOI:10.6258/bcla.201811_(90).04
- _____：〈迷路的詩——明代士人的習詩情緣與人生選擇〉，《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0期，2005年12月，頁1-54。DOI:10.6353/BIMHAS.200512.0001
- 李志宏：〈《儒林外史》敘述者形象及其敘述的可靠性問題〉，《國北教語文集刊》第20期，2011年7月，頁123-168。DOI:10.6777/JLLS.201107.0123
- 謝佳滢：〈論《儒林外史》的抒情地景——以南京和蘇杭為例〉，《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2019年第33卷第1期，頁23-42。

(三) 學位論文

- 鄭睿衫：《《儒林外史》的人倫觀研究》，臺北：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9年。DOI:10.6345/THE.NTNU.DCH.007.2019.A08
- 劉柏正：《讀史與述事：馮夢龍作品之歷史意識與政治關懷》，新竹：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9年。